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陕北民歌文化 负载词英译研究

——以《西北回响》为例

冯燾燾

西安理工大学, 中国·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近些年, 中国综合实力提升, 国际影响力逐步提高, 同时“一带一路”的提出, 使得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交融。中国文化走出去, 已是迫不及待的命题。文学作品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其英译更是为中国文化走出去, 促进跨文化交流, 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承载中国地方特色文化的陕北民歌英译, 在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自信。本文运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对《西北回响》中文化负载词英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对陕北民歌英译具有指导价值, 并为推动陕北民歌这一优秀文化遗产走向世界提供动力。

【关键词】陕北民歌;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西北回响》; 文化负载词

陕北民歌作为中国特色文化的代表, 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 陕北民歌的英译为中国地方特色文化走出去促进中国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提供动力。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研究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及译本对目的语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作者认为,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可以作为陕北民歌英译研究的一个有效理论指导。《西北回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王宏印教授对第一版《西北回响》加以修订出版的陕北民歌集。研究发现, 国内学者多从生态翻译学、阐释学、目的论、翻译美学等角度研究陕北民歌, 因此本文选取王宏印教授的译作《西北回响》作为语料, 分析研究后殖民翻译理论尤其是其归化、异化以及混杂性翻译理论指导下陕北民歌文化负载词英译的英译过程。

1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后殖民翻译研究是后殖民理论的一种应用状态”^[6]。后殖民主义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 是后殖民研究与翻译结合的产物, 其理论主要涉及文化与权力以及文化殖民等问题。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 是建立在结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目的论等基础上的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该理论是第三世界用来促使本民族文化改变文化边缘地位, 重塑文化身份平等参与文化交流与对话。

中国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大多始于20世纪末, 但研究发现中国的后殖民翻译研究有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仇外的情绪在里面。在理论上, 我们过于强调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对抗性。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不仅仅有对抗和冲突, 还有和谐与融合。^[7]因此本研究将从归化、异化、混杂性三个方面重新进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旨在找出中国后殖民翻译研究更好的方法。

2 文化负载词

在语言系统中, 最能体现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词汇就是文化负载词。文化负载词又称词汇空缺, 即是指“源语词汇所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或对应语”^[9]。一般来说, 语言包括词汇、语音、句法和语篇, 词是语言的最小单位, 它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且文化差异在词汇层面最为突出和广泛。杰弗里·利奇曾指出: 一个词由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两个层面组成。外延意义是指一个语言符号所指的对象或事物, 而内涵意义是指语篇中话语所产生的态度和信念。^[2]文化负载词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意义。胡文忠提出: “在语言系统中, 文化负载词是即能反映人来社会生活且最能体

现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词汇。”^[3]每个语言都有其特有的文化负载词, 代表了其特有文化的价值系统、历史、宗教、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奈达(1993)将文化负载词划分为五类: 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和语言文化负载词。^[1]生态文化负载词反映了一个语言群体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等特征状况。山、水、植物、动物、城市的名称及其所涵盖的联想意义, 都是承载生态文化的符号。

物质文化负载词是指人类所建构的各种物质元素, 包括车辆、服饰、工具等日常用品, 是一种看得见的文化。不同文化背景人类生活习惯不同, 所使用的部分物质也会有所不同。

社会文化负载词是指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承载某一种语言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制度、习俗等的语言符号。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制度与习俗与英语语言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尤其是地方性的民俗生活更是与之大为不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社会文化的进步, 中国一些地方性的文化负载词的表达意义发生变化甚至消亡。

宗教文化负载词包括对神的称呼以及宗教称呼和信仰。^[4]例如中国对神明的称呼称为“神”, 而英语语言国家因信仰基督教等, 对最高神明的称呼为将“上帝”。

语言文化负载词是指某一语言群体的音位系统、语法系统和结构系统的变体。由于英语和汉语隶属不同语系。语音方面, 汉语有4个声调, 而英语只有两个音调。从句法层面看, 汉语句法结构注重意义结合且使用连词较少; 而英语句法结构注重形合, 多用连词连接各句中关系。

3 《西北回响》简介

《西北回响》是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宏印教授翻译并修订完成的译本陕北民歌集。书中按内容分为十个部分, 分别是: “黄河颂”, “西北剪影”, “劳苦的日子”, “多彩的爱情”, “思念的痛苦”, “秧歌词调”, “流浪岁月”, “火红的旗帜”, “走近新时代”和“唱不完的信天游”, 总共105首陕北民歌及其英文对照翻译。虽然陕北民歌曾被零零散散改变和翻译过, 但是真正以大型集子形式出版的陕北民歌英译本仅有《西北回响》。李林波曾说明: 《西北回响》英译集的出版是陕北民歌向外翻译传播的首创。^[10]

4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陕北民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

4.1 异化翻译策略视角下对文化负载词的研究

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是译者为了故意对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进行冲击而保留原作中的一些“陌生性”的翻译策略。后殖民主义中的异化是指译语译者和读者能够摆脱强势文化的限制,提升本民族文化地位。而在《西北回响》中译者在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过程中就有很多异化的例子:

在《陕北是个聚宝盆》中,译者将源语的“毛皮”译为“sheepskin”。因陕北传统生活习惯影响,人民所穿戴的毛皮多用羊皮制作,这样即保留源语文化特色,又有利于目的语文化读者理解陕北地方性的生活习惯。

陕北民歌经典《兰花花》中:

正月里(那个)说媒,二月里定,
三月里就交大钱,四月里迎。
三班子(那个)吹来,两班子打,

In the first month she saw a matchmaker, in the second she's engaged.

In the third the down payment given and the next she's taken in.

Three troupes blow the trumpets, and two beat the drum

and gong

译者将中国农历月份“正月”“二月”“三月”“四月”译为“the first month”“the second”“the third”“the next”,并没有译为目的语文化相对应的月份。这样能够让目的语文化读者更好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农历月份,同时了解中国地方性的婚姻民俗文化。

在《打樱桃》中,译者将“阳婆婆”译为“The Granny Sun”,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源语文化的特点。在陕北民俗中,人们将慈爱的老妇人称为“阳婆婆”,在译文中译者将“阳”译为“sun”,给目的语读者以温暖的感觉。在《把你的白脸脸掉过来》中,将“兰花花”译为“Blue Flower”,“兰花花”本为人名,译者在这里运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源语文化,体现出女性的柔弱,让目的语读者更好了解中国地方性民俗中称谓语的表达。

而译者对“走西口”的翻译也体现了异化策略,“走西口”原意指旧时关内百姓为生活所迫,出山西长城诸口以谋生。而译者在这里讲其译为“You go to Xikou”,将原文中“西口”直译为“Xikou”,更好的保留源语历史文化内涵,使得目的语读者更好的了解中国地方历史。

在本书中,译者将许多语气词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翻译出来。例如:“哦呵呵”译为“Aihai-yoooooooooh”,“哦”译为“Oh hooooohooo”,“哟呵呵”译为“Yaohooooohoo”等,在保留目的语语序的同时,更有利于传播目的语文化。

4.2 归化策略下对文化负载词的研究

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是译者为了故意对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进行冲击而保留原作中的一些“陌生性”的翻译策略。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中的归化是指避免占支配地位的强势文化处于边缘地位,有利于消除文化差异。

在《陕北是个聚宝盆》中,译者将“旱烟”译为“Tobacco”,因目的语文化中没有可以相互替代的词语,作者在此处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用“烟草”替代源语文化“旱烟”。

在《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中,沙蒿蒿为陕北特有的一种常年生草本植物。因目的语文化中没有相对应的植物与其对应,因

此译者运用混杂性的翻译策略将“沙蒿蒿”译为“sand bush”。使得译文能够更好地体现源语文化的生态环境。

在《一疙瘩冰糖化成水》《想你哩》《走西口》中,译者分别将“哥哥”“三哥哥”译为“my sweetheart”“my dear”。因在陕北民俗中“哥哥”多为女子对心上人的称呼,因此译者在此处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使得目的语文化读者更好的理解中国传统民歌。

《小寡妇上坟》中:

一头绣的洞宾戏牡丹,
一头绣的吕布戏貂蝉。

I embroidered Eros playing with penoy,

And also Cupid flirting with a beauty, for a change.

译者将“吕洞宾”“吕布”译为西方神话中的爱神“Eros”和“Cupid”。在《揽工调》中译者将“丧门神”译为“a black cat”,在《老井》中将“青天”译为“earth”,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丧门神”指阴间的一种凶煞,又称“丧门星”、“丧门”。丧门降临,家庭必遇凶险祸事,因此常用来指不祥之人。而“青天”在中国文化中不仅指天空,同时也代表公正。译者在这里运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用目的语国家同为不详的“black cat”,以及用更能体现出源语求助无望情感的“earth”来代替源语宗教文化习俗。

《打腰鼓》中译者将“月弯弯,星闪闪”译为“The moon is beaming, and the star twinkling”,因目的语与源语文化语序不同,若将此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难免使得目的语文化读者不能理解源语文化,因此译者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进一步推动中国民俗文化对外传播。

4.3 混杂性策略下对文化负载词的研究

混杂性理论是霍米·巴巴在后殖民主义视域下对文化定位的关注中提出的,《文化的定位》以及后来的一些论文重点思考了民族、边缘性、地域、历史、位移和居间的疆界等问题。霍米·巴巴在考量世界文化特征时,否定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提出文化差异性这一区别于文化多样性的表述方式。就文化身份而言,混杂性表明不同文化间不是分离迥异的,而是相互碰撞的,这种碰撞和交流就导致了文化上的混杂化。^[8]而这种混杂化在翻译中则体现出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在《西北回响》中混杂性翻译策略也多有体现。

《野店》中,译者将“热炕”译为“warm kang bed”,这里运用混杂性的翻译策略,保留源语文化的“炕”,同时在其后加入“bed”,即保留了源语文化的特点,使得目的语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陕北民俗物质文化。

在秧歌词调一章中,译者将“秧歌”其译为“Yangge dance”,秧歌为陕北特色民族文化遗产,在其后加入“dance”在保留源语文化的基础上,使得译者理解秧歌是中国传统民族舞蹈文化的代表之一。

在《女儿歌》中译者将“沙鸽”译为“wild pigeon”,《卖货郎》中译者将“宁夏麻”译为“flax from Ningxia”,译者采用混杂型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文保留源语文化特点的同时推动目的语文化读者对中国地方特色文化的理解。

在《老井》中:

今天它眼里情悠悠,情悠悠,
情悠悠,情悠悠。

And today it seems to be wet with tears,

And wet with tears.

译者将“情悠悠”运用混杂型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在运用异化策略的同时保留源语文化的语序格式,使得译文在体现源语文化的同时,更能让目的语文化读者了解中国民俗歌曲,以及语言文化。

5 结论

陕北民歌作为陕北地区传统歌曲,中国地方性民俗文化的代表,是传达地方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倾诉情感的有效方式,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地方性文化习俗和地域风貌。但因其特有的文化特色,也使其在传播中国文化,吸引文化读者的同时,在翻译传播方面增加难度。因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仅仅是会涉及到的一部分。本研究在后殖民翻译论指导下,通过对《西北回响》中陕北民歌文化负载词英译的分析,了解译者翻译风格,为陕北民歌翻译研究做出一定指导借鉴,使读者从全新的角度深化对陕北民歌的认识,并进一步推动中国地方特色文化走出中国。对于陕北民歌的研究,有利于提高中国文化自信,从而提高中国国际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 [1] NIDA 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2] Guo Jianzhong. Translation of Popular Science Fiction:

Theory Techniques & Practice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3] Leech, Geoffrey. Semantics: The study of Meaning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1: 25.

[4] Angus C. Graham, Poem of the Late Tang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5), 19.

[5] 王宏印. 西北回响: 陕北民歌英译 [M]. 北京: 商务印书出版社, 2019.

[6] 王东风. 归化与异化: 矛与盾的交锋 [J]. 中国翻译, 2003 (5): 24-26.

[7] 向鹏. 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研究 [D].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8] 胡洁娜. 后殖民主义视域中的混杂性理论 [J]. 广角, 2013 (5).

[9] 包惠南. 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 [M]. 外文出版社, 2004.

[10] 李林波. 在诗中聆听歌的回音——评《西北回响》兼论陕北民歌的翻译 [J]. 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2009 (3): 79.

作者简介:

冯翥翥(1997.1-), 女, 汉族, 陕西渭南人, 西安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19级在读研究生, 硕士学位, 专业: 外国语言学, 研究方向: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上接146页)

特点, 对传统建筑的“形”进行结构再重组。如,“重庆世界博览会展示中心”便是巧妙地借助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筷子以及传统建筑的“斗拱”式建筑框架, 进行形态结构, 然后再予以重塑, 给重庆世界博览会展示中心这一现代建筑赋予新的文化内涵, 重新定义了现代城市建筑。

与此同时, 也让“斗拱式”这一传统建筑标致得以在现代建筑中得以重现, 富有现代化气息的同时兼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二,“神”的妙用, 如果说“形”态是一个建筑物的建筑核心要义之所在, 那么“神”形则代表着该建筑物的建造灵魂。形态的重新结构与拼接、重组带来的是现代城市建筑外在形态的改变, 而“神”的妙用则是现代城市建筑的精神内核。比如说, 南方人民的建筑展现出了木之细腻; 北方人民的建筑, 体现土之敦厚, 南北方建筑的“神”于“形”各有千秋, 两者相互搭配、相互成就形成了属于自己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

这就要求现代城市建筑设计在沿用民族传统形制的时候不仅要关注建筑物的外在形态, 而且要注意将当代文明特色、人文景观、社会风俗等予以表达, 将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神”态进行表达继承与发扬。使得现代城市建筑物既能将“形”态进行完整表达, 又可以将“神”态的精髓进行诠释。国内的许多建筑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中“神、形”的完整表达与完美契合。

2.3 在室内设计中应用民族传统文化

在当今社会, 室内设计风格种类繁多。大多数人会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来选择设计风格, 其中, 现代“中式风”在近些年广受人们的喜爱。现代“中式风”格调典雅、文化内涵丰富, 给人一种东方美学的视觉冲击。在现代中式风格室内设计中, 家具材料多以木材为主, 上面雕刻着龙、凤、狮子等民族传统元素的图案; 墙上装饰多以中国画或笔墨书法为主; 橱柜中的茶具、酒具也大多以中国瓷器为主, 这些生活日常用

品都带有浓厚的民族传统色彩, 突显了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此外, 在我国的春节或嫁娶这种重要又喜庆的日子里, 人们会在窗子、门等位置贴上手工剪纸作品, 如“囍”字、“福”字等, 都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这种室内设计风格, 将现代艺术设计与民族传统文化和谐交融在一起, 既为人们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空间, 又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 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艺术设计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在当今社会, 艺术作品要达到既美观又实用的效果已经成为衡量艺术水平的核心因素。因此, 如何在艺术设计中合理应用民族传统文化, 从而充分展示出具有我国特色的设计理念与风格, 已经成为艺术设计行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着手于民族传统文化与艺术设计的联系进行分析, 提出了几点应用策略。如, 在服装设计中应用民族传统文化、在城市设计中应用民族传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应用民族传统文化等, 以期能够为相关人士提供参考, 从而推动艺术设计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 陈玲. 探讨民族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J]. 参花 (下), 2020 (08): 102.

[2] 王明俊. 民族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J]. 鸭绿江 (下半月), 2020 (15): 142-143.

[3] 田文. 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艺术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评《中国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传统文化》[J]. 环境保护, 2020, 48 (Z2): 109-110.

[4] 赵丽丽, 赵惠仙, 刘若瑜, 范宁. 中国传统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融合与应用分析 [J]. 才智, 2019 (20): 200.

[5] 何祥鹏.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J]. 艺术家, 2018 (06): 26-27.